

依田 憲 家 先生 古 稀 纪 念 论 文 集

中日文化 与 政治经济论



徐静波 陈建安 王少普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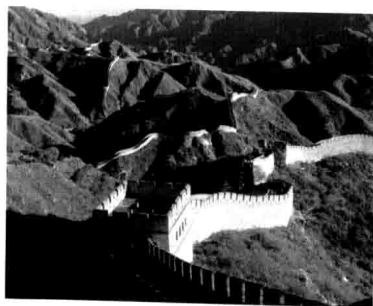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依田 憲 家 先 生 古 稀 纪 念 论 文 集

中日文化 与 政治经济论



徐静波 陈建安 王少普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日文化与政治经济论 / 徐静波, 陈建安, 王少普主编. —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1
ISBN 7-309-03829-0

I. 中... II. ①徐... ②陈... ③王... III. ①比较文化—中国、日本 ②政治—对比研究—中国、日本 ③经济比较—中国、日本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1678 号

中日文化与政治经济论(依田憇家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
徐静波 陈建安 王少普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邬红伟

装帧设计 孙 曙

总 编 辑 高若海

出 品 人 贺圣遂

印 刷 句容市排印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7 插页 2

字 数 428 千

版 次 2003 年 1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9-03829-0/D·242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郑勵志

2002年春天,年届70的依田憇家先生从服务了数十度春秋的早稻田大学退休,因其多年来在学术界及对大学的杰出贡献,而被授予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他同时还是我们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顾问教授,他一直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

我与依田先生相识于1980年。那一年我在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11月的一天,同在东京做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史的研究专家万峰先生邀我一同去看望在早稻田大学任教的依田先生。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是一位十分儒雅的学者,谈吐温婉,思路清晰,对中国的情形相当熟悉。后来才知道,依田先生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开始与中国交往,长期致力于日本近代史和中日近代化的比较研究,已经出版了多种研究著作,其中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在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好评。

我的专业是经济学,对依田先生在历史学领域的研究业绩,我不敢妄加置喙,好在已有众多的同行作出了充分的评价。但对依田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中日友好的拳拳之心和古道热肠,我却有着深切的体会。“文革”前及“文革”中依田先生对中国的访问姑且不论,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后,依田先生几十次来往于中国和日本之间,频频造访北大、南开和复旦诸大学,举办各种讲座,为复苏不久的中国研究界热情介绍日本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研究动态,畅

谈自己的研究心得,与中国的同行切磋交流,不久就在中国结交了一大批朋友,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多次向有关机构捐赠书刊,就我们日本研究中心而言,他每年都向我们捐赠钱款,资助我们的研究事业。他自然不是什么丰裕的资本家,只是大学中的一介教员而已,但他愿意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学术事业的一片赤诚之心。至于受到他提携、培育和教导的中国青年学子,就更是数不清了。他还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给予我们热情的支持,凡是我们的召开与依田先生的专业领域相关的学术会议,他总是欣然前来参加,发表精彩的学术报告。

以后我与依田先生曾有无数次的晤面,或在东京,或在上海,或畅叙旧谊,或放论古今,虽专业有别,情趣却是十分投合,20多年来,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在依田先生 70 寿辰之际,遍及中国各地的先生的友好、弟子和晚辈各自奉上了研究中日关系的学术论文,汇成这样一本论文集来纪念先生的 70 寿辰,并以此来彰显他在促进中日友好方面的不平凡的贡献。我已是耄耋之年,且专业相隔,无力写出有分量的纪念论文,只能以此小文,权作本书的序言,来表达我对依田先生的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理事长)

2003 年 3 月

序 二

郭焰烈

今年4月3日是依田憇家教授70华诞,用什么纪念、祝贺他的诞辰?不是鲜花,也不是美酒,对以学术为自己生命的依田憇家教授来说,对他诞辰最好的纪念与祝贺是学术的更大繁荣。为此,我们这些或是依田憇家教授的朋友,或是依田憇家教授的学生的中国学者撰写、编辑了这本论文集,以隆重纪念、真诚祝贺依田憇家教授的诞辰。

依田憇家教授是中日近代史和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所著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深入而具体地剖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原因、造成的后果与影响,对于正确总结历史教训,推动日本走和平道路,发展中日友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所著的《日本的近代化——和中国比较》,根据对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的准确把握,从广阔的视野,对近代化过程中的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加深了人们对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独特性的认识,对于中日两国正确借鉴对方经验,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依田憇家教授的这两本书以及其他一些重要著作都译成了中文,受到中国学界与广大读者的欢迎。

依田憇家教授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他过去的70年中,可以说主要作了两件事,第一是著书育人,第二便是发展中日友好。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依田憇家教授就曾作为日本学生访华代表团的顾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奔走呐喊。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他又担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中央本部常任理事,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殚精竭虑。他门下中国留学生数量之多,在日本无人能出其右,为中国造就了许多有用之才。他几乎跑遍了中国除台湾省以外的各个省和地区,授课解惑,因而被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著名大学聘请为顾问教授。依田憇家教授生活简朴,淡泊宁静,但资助中国留学生却毫不吝啬,现今活跃在中国的日本研究学界中的不少学者是他资助过的学生。依田憇家教授的古道热肠、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像春雨润物一样,无声但却有力地消弭着历史在中日两国人民间形成的隔阂,成为中日友好交往史上又一段感人至深的佳话。

当年中国的大英雄曹孟德暮年志壮,意气风发地抒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以当代人的寿命特别是平均寿命居世界之冠的日本标准来衡量,依田憇家教授离暮年尚远,志当更在千里。祝依田憇家教授健康长寿,为学界再献精品,为中日关系再创佳话。

是为序。

(作者为上海日本学会名誉会长)

2003 年 4 月 3 日

早稻田大学退休感怀 ——早稻田街区的今昔

依田憲家

今年3月我终于要从早稻田大学退休，离开我50年前入学、工作了将近40年的这所大学。

同时早稻田这一地方，也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土地，在这里留下了我将近70年的人生回忆。在离开早稻田之际，我脑海中浮现出了这一时期的几段回忆和早稻田街区的昔日的街景。

幽暗的楼梯上挂着的几个假面具……坐在椅子上的人物的铜像……布满了整个屋子的仿佛是木头一般的古代大象的化石……所有这些场景，都是我还未上小学的时候，由父亲牵着手带我去早稻田大学时最初留下的模糊的印象。

事后回想起来，楼梯上的假面具是演剧博物馆的一角。坐在椅子上的铜像，是曾经担任早大校长多年的高田早苗氏的铜像（正门内矗立着大隈先生的铜像，但小时候也许是由于身高的缘故，印象中只留下了稍矮的坐像）。古代大象的化石布满了房间，特别是对象牙和臼齿印象很深，此外在陈列室角落的玻璃柜中展示出来的小象的化石也留在我的印象中。我想这该是理工学部楼内采矿冶金学科（后来分成资源工学科和金属工学科）的地质学教室。那时后来成了著名生物学家的直良信夫氏也许也在那里，其时直良氏在主任德永重康博士的手下帮忙。战后我在文学部听直良先生

的课时,问起那些古代大象化石的事,他告诉我说,“那些东西都在战火中烧毁了”。

那个时候的建筑物也烧毁了,在这遗迹上建起了我后来曾工作了 30 多年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室。

1931 年 4 月,我出生在距早稻田大学步行 10 余分钟的南早稻田町。夏目漱石去世时所住的宅邸就在同一个街区内。差不多在 10 岁以前我一直住在那一街区内。我父亲、兄长、叔父也在早稻田大学求学,后来我的外甥和侄子中也有好几个人进了早稻田。因为这些缘故,从刚懂事起,我就记得了校歌《都城的西北》。

我上的小学是牛入区(现属新宿区)的区立早稻田小学。因离大学比较近,附近有不少学生住的小公寓和出租房屋给学生居住的住家,到了早庆战(主要是指早稻田大学和庆应大学之间的棒球比赛——译者注)的夜晚,可以听到学生在街上昂首阔步高歌放吟的喧闹声,早上一早也可以听见大隈讲堂的钟声。小学一年级的春游,去了现在文学部附近的户山高地,当时是近卫骑兵队的所在地,那儿还可见到野生的山鸡,这些情景现在的人简直都无法想像了。这支骑兵队手持枪头上缀着三角形的红白仪仗旗的长枪,骑在马上行进在早稻田大街上。这一带是小生活动的天地,东面到九段的靖国神社,春秋两季的庙会时,从神乐坂一直到九段为止,两边都排列着临时搭建的小店。西面则是到高田马场的铁路桥为止,住在这一带的小学生都有一点自鸣得意,他们称铁路桥那一边的人为“乡下人”。现在理工学部一带以前是陆军的射击场,时常传来一阵阵枪声。

上下课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穴八幡一带,在这附近住着不少同学。因此大隈讲堂一带也就成了我们玩耍的范围之内。现在在大隈讲堂前的广场上也时常可见到孩子们玩耍的身影,而这些场景对我来说真是再熟悉不过了。以前的歌谣中曾有“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的词句,我当时就是早稻田大学门前的小和尚,但是经

文却怎么也念不好。

位于大隈讲堂东面的早稻田大街，现在中央有一条绿化道，战前这儿也有一排房子，也就说平行着两条路，当时两边都称作“大学街”。大正时代开通了山手线，从那时起大部分学生便从高田马场方向来学校上学了，而在这之前学生多从九段、神田方向来上课，所以大门就开在了朝东的方向。

战前的“早稻田大街”，也就是早稻田大学的门前街，就是所谓老城区一样的地方，除了酒馆、酒吧、咖啡馆、饮食店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吃食店、棋馆、麻将俱乐部、气枪馆等，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夏天，在附近的空旷地上用竹子围建起了看西洋景、看杂耍的各种摊棚，那时我的住所附近正是最热闹的地方。据说那种将山芋油炸后裹上蜜糖的“大学芋”就起源于这里（不过也有人说这种芋叫“女子大芋”，或许也有可能它的本家在目白那里）。

这一带是我上小学时孩子们活动的范围，实在是非常开心的地方，不过同时它也是附近鹤卷小学和山吹小学（现在是赤城台高中的所在地）的孩子们活动的范围，有时会有一些高年级的“恶少”，一个人走过时，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有时候我们这边有几个胆大的，挺起胸脯说：“老子就在这里大声三呼‘鹤卷！鹤卷！鹤卷！’怎么样！”不料话音刚落，就突然窜出来几个面目狰狞的恶少来，叫道：“妈的，你敢再说一遍！”吓得跟在后边的人一窝蜂似地逃走了。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时是日美开战的前夜，与罗斯福总统交情深厚的斋藤大使在美国去世，美国巡洋舰阿斯特利号将他的遗骨送到了日本，在大隈讲堂为舰组人员举行了欢迎会，附近小学的小学生手拿着太阳旗和星条旗在讲堂两边列队欢迎。美国的水兵身穿藏青色的军服，头戴白色的帽子，对挥动着旗帜表示欢迎的小学生很可爱地挥着手回应道“万岁”。看着他们的这一模样，再比较一下行进时两眼正视前方满脸严肃的日本水兵，觉得这些美国

人有很大的不同。2年后,美军对东京的第一次空袭,炸弹就落在了大隈讲堂的近旁。

日美开战的几天之后,周边几所小学的儿童,汇聚在现在已经建起了图书馆和亚太研究中心的户冢球场,在那里聆听了“宣战诏敕”。

小学毕业的那一年正是战败的前一年,战局每况愈下,塞班岛也已经失陷,美国正准备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当局鼓励大家疏散到外地去。因此我疏散到了老家的长野县,在那里上了旧制的中学。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自1931年以来的“15年战争”结束了。东京自1944年年底起遭到了激烈的轰炸,战后在食物供应和住宅方面出现了非常艰难的局面,因此我在长野一直住到了1949年。那一时期,差不多每过半年学制就要更改,即使同一个年级,有人从旧制的初中毕业,有人被编入了新制的高中。在这样的变动期里,从1949年4月开始了新的大学体制,同时废除了早稻田大学旧制中大学预科的旧制高等学院,建立了新制的高等学院,新的学院同时招收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生。这是由于旧制高等学院的一年级学生将转入新制大学的一年级,新制高等学院倘若只招收一年级学生的话,就会产生2年的空当,因此采取了这样的措施。就这样,我被编入了新制高等学院的二年级。

相隔5年之后再次回到东京,“故乡”早稻田已经变成了何等的模样!大隈讲堂的大钟虽然依然高高耸立,但“大学街”一带已经完全被烧毁,从附近小学被烧毁的楼房中逃生出来的人们,在操场上用薄板搭建起了简陋的小屋住在里边,站在穴八幡的石阶上望出去,一直到九段都是一片焚烧后的废墟和荒野。住在附近的小学时的同学,除了几个人以外,大都杳无音讯。

轰炸给大学造成了很大的损害,战前曾是大隈宅邸的书院风格的大隈会馆已经荡然无存,里边的庭园也一片荒芜,幸好演剧博

物馆只是屋顶被炸毁,如今临时覆盖着镀锌的薄铁板。与三田的庆应图书馆一样用明治天皇的“御下赐金”建造的砖瓦建筑“恩赐馆”如今也只剩下了断垣残壁。各学部的建筑,很多都遭到了从窗口飞进来的燃烧弹的攻击,里面的教室多被烧毁,房顶已被掀掉,从底下往上看,可见到房顶里边的电线,没有灯罩的电灯泡就从这些电线中垂下来,一片凄惨的景象。

校园内及周边地区因战争遭到了重大的创伤,但通向高田马场的大街却安然无恙,街上的旧书店也在战火中幸免于难,这实在是值得庆幸的事。此外,东京市内能容纳很多人的建筑物或因战火烧毁,或被进驻军(占领军)接受用作剧场,因此市内能容纳大量人员的建筑就只剩下了神田的共立讲堂和大隈讲堂几所了,由于这一缘故,战后重新恢复起来的歌剧和话剧很多就在这里公演,对我而言,觉得这些活动离自己很贴近了。

大学里满是学生。因“学徒出阵”(战争后期日本军部当局为动员在校学生上战场打仗而强行推行的一项政策——译者注)而被驱赶到战场上的学生一下子复员归来,原在陆军士官学校、海军学校和其他与军队有关的学校中学习的人,因军队的解散而被编入各个大学,所以学生的人数异常地膨胀起来了。当时由于衣食住的物质供应极其匮乏,这些学生就穿着军服来上学,校园里交杂着卡其色的陆军服、藏青色的海军服和黑色的学生装。大学附近的咖啡馆也重新开张了,但是原料不是进口的真正的咖啡豆,而是将大豆炒焦后用些化学药品增加些甜味而已。

我入学的新制高等学院,现在想起来也是蛮奇怪的学校。由于早稻田大学没有作为新制高中母体的旧制高中,所以新制高等学院似乎只是将旧制高等学院换了块招牌而已(“旧制”“新制”只是制度上的不同,名称本身并没有一一发生变化,因此其实连名称几乎也没有改变)。在这一年的3月份,以前用作旧制高等学院的房子(位于现在的文学部内),从4月份起就变成了新制学院的建

筑,旧制的院长、教务主任依然获得留任,教员基本上也是原班人马,不少人还兼任大学中的老师。课程分成文科和理科两大类,第一外语英法德俄语中任选哪一种都可以,有几个人选了俄语。同时也是教育学部国语国文学科教授的竹野长治院长教授文艺课,文学部的坚山钦四郎教授教授哲学课,教师的阵容相当不错。

学生也是多种多样,有从旧制初中毕业的,有4年学业结束后在社会上荡了好几年的人,因为从翌年起若没有新制高中毕业资格的人就不能进大学了,所以一下子都匆匆忙忙涌了进来。

那年入学的事如今想起来已经是差不多50年前的事了,从那以后直到今天,我一直生活在早稻田的圈子里。大学本科我进了文学部的史学科,分别在东洋史和日本史两个专业各学了3年,总共花了6年(以日本史专业毕业)。在这两个专业中学到的知识对我以后的研究都获益匪浅。在研究生院中我攻读的是商学研究科的经济史。

长达50年的大学生活,占据其主要部分的是在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工作,1958年我在这边兼职以来,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到教授,1998年该研究所又发展为亚太研究中心。期间令我感怀最深的是,真是有缘,我在这边接待了很多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并且作为日本方面的指导教授承担了培育在中国的大学中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任务。这些人的大部分现在都在中国各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中担任了要职,也有人在日本的大学中担任了教职。这次为庆祝我的70岁古稀之年,大家建议在中国出版纪念论文集,这是使我非常感激的事。

此外在临近退休的几年里,我参与了亚太研究中心的建立,建立后又好几次有机会与包括众多留学生的研究生一起去外地作学术旅行和考察,这些可以说都成了我人生中愉快的回忆。

最后在我离开早稻田大学之际,请允许我作为将要消失的一名老兵,从早稻田大学的传统出发,对亚太研究中心的未来作数语

建言。

已有 120 年历史的早稻田大学的传统和特征,迄今已有很多人述及。我这里想要强调的是,早稻田大学是一所很早就开始在培养研究者方面倾注了努力的学校。

早稻田大学在明治中期以后就已经培养了为数可观的研究者。作为建校精神的“学问的独立”,倘若没有研究者的培养,就无法得以贯彻。早大在培养研究者方面之所以成果斐然,就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比起录用帝国大学毕业的学者来,从基础开始培养研究者在经济上所花费的代价要高得多,但是很早就敢于如此特立独行的早大,在当时确实是富于远见卓识的。因此大正时代各学部的主要课程,就是由这样培养起来的教员担任的。这一点,与其他私立大学相比,显然是遥遥领先的,除东京大学之外,在国立大学中也是走在前面的。

同时这一时期培养出来的研究者,除了在东北帝国大学的村冈典嗣氏等极少数人之外,帝国大学和在其影响下的各个大学都不会录用你。因此,这些研究者就只有为母校所录用,在母校贡献自己的力量了。也正是有了这样的可能性,年轻的研究者就能够满怀希望地在研究上拼命努力了。近年来校外人士批评说“大部分教员都是自己学校培养出来的”,其缘由就在于此。因为早大很早就注重培养研究者,并且做到了这一点。

如今时代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用说,录用研究者时,不应顾及他毕业的学校或是国籍,应该惟贤是举,培养的学者也应该让他在校内外发挥作用。

同时我希望早稻田大学能够珍视很早就自己培养研究者、并且成了这样的一所大学这一优秀的传统。

包括我们自己的研究科,也包括其他的学部和研究科,不仅要培养研究者为目的,而且也要注重培养实业界、新闻界、公共机关和其他领域中的人才。但是,能够培养研究者的大学这一点是

根本,我深信,惟有这样的大学才可能与时俱进,不断地发展下去。作为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建立“早稻田大学亚太学会”,给予年轻的研究者研究和发表的机会,或者给他们提供一个与校内外学者进行广泛交流的舞台。

(徐静波译)

依田憙家教授退休之际感言

小林英夫

2002年3月,亚太研究中心教授依田憙家博士迎来了他70岁的寿辰,同时为他在早稻田大学长达36年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即便已经到了70岁的今天,他那旺盛的求知欲、精力和体力仍是我等之辈所望尘莫及的,我们真是期望他能继续活跃在教学和研究的第一线。但是因为退休制度,所以非常遗憾,在公的形式上,依田先生算是要与我们亚太研究中心告别了。

1957年依田先生自早稻田大学第一文学部史学科日本史专业毕业后,在津田塾大学担任讲师,后又到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任助教,此后就作为一个早稻田人一直为母校的发展竭尽心力。特别是先生对于中国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切,对于中国留学生和中国研究者倾注了热情的关怀,由他培养的中国研究者多达10余人。我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在大学里人们常常会问起“依田先生现在怎么样了?”先生自南开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被复旦大学授予顾问教授、北京大学授予客座教授,可说都是源于与中国之间的这些深刻的维系吧。

关于依田先生自己的经历和研究业绩,先生自己有很详细的整理和记录。先生研究的中心在于日本近代史。而且他重点研究的地主制度,在当时是日本史研究的传统性领域,先生在这方面可

谓独树一帜。

但是,先生并没有止于此,而是将研究的触角继续伸向了殖民地研究和近代史的研究,最后到达了日中近代化比较这样一个研究视角。此外,先生在翻译领域也做出了相当的成绩,翻译了不少像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这样为世人所知晓的著作。先生曾说,“翻译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想他一定是乐此不疲,从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

先生其实是很时髦的,这从他的外观上不容易察见(他善于在不引人注目之处巧下功夫)。他还善于使用像电脑这一类的“新式武器”,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情趣。他说话带有东京的口音,这就使得他的形象更为生动。

但说到底,先生毕竟是属于传统的类型,市面上的流行时尚、热门话题,他大抵都充耳不闻,只是热衷于自己喜欢的领域。著作不能算多,但充满了先生独特的厚重味的论文不可谓少。其气势规模之大,倒是不像日本人,而是具有一种大陆文化的大气。总之,我觉得依田先生的退休,似乎意味着早稻田大学的某一时代的结束。

“这么多年来您辛苦了。”这句话虽能表达出我们一部分的感激之情,却无法排解先生走后的弥漫于心灵内外的寂寥感。我们衷心祈愿先生今后保重贵体,继续奖掖鞭策我们这些后学晚辈。最后,我们研究生院和研究中心的全体同仁衷心祝愿先生安泰幸福,学业隆盛。

(作者为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太研究科委员长,徐静波译)